

Science and Politics



中青年学者文库

欧阳哲生◎著

科学与政治

——丁文江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Science and Politics

欧阳哲生◎著

科学与政治

——丁文江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欧阳哲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14842-6

I. 科… II. 欧… III. 丁文江(1887~1936) — 人物研究
IV. 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36 号

书 名: 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

著作责任者: 欧阳哲生 著

责任编辑: 舒 岚 张 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42-6/K·05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02@sina.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25.25 印张 362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	(1)
一、一个高级学者的知识准备	(5)
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开拓者	(13)
三、其他领域的学术成就	(26)
四、“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收获	(44)
五、介入国内政治生活	(61)
六、“苏俄经验”与思想调整	(81)
七、未尽的军事才能	(91)
八、中央研究院的“阁魁”	(100)
九、人际交往与友情天地	(118)
十、丁文江文献整理	(136)
丁文江先生年谱	(140)
1887 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一岁	(140)
1892 年(光绪十八年壬辰) 五岁	(147)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九岁	(147)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十一岁	(148)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十三岁	(148)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十四岁	(148)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十五岁	(149)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十六岁	(149)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十七岁	(150)
1904 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十八岁	(152)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十九岁	(159)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二十岁	(161)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二十一岁	(162)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二岁	(163)
1909 年(宣统元年己酉)	二十三岁	(164)
1910 年(宣统二年庚戌)	二十四岁	(164)
1911 年(宣统三年辛亥)	二十五岁	(164)
1912 年(民国元年壬子)	二十六岁	(171)
1913 年(民国二年癸丑)	二十七岁	(173)
1914 年(民国三年甲寅)	二十八岁	(178)
1915 年(民国四年乙卯)	二十九岁	(183)
1916 年(民国五年丙辰)	三十岁	(186)
1917 年(民国六年丁巳)	三十一岁	(189)
1918 年(民国七年戊午)	三十二岁	(189)
1919 年(民国八年己未)	三十三岁	(191)
1920 年(民国九年庚申)	三十四岁	(200)
1921 年(民国十年辛酉)	三十五岁	(203)
1922 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三十六岁	(210)
1923 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三十七岁	(218)
1924 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三十八岁	(225)
1925 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三十九岁	(230)
1926 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四十岁	(243)
1927 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四十一岁	(267)
1928 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四十二岁	(276)
1929 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四十三岁	(285)
1930 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四十四岁	(293)
1931 年(民国二十年辛未)	四十五岁	(297)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四十六岁		(303)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四十七岁		(310)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	四十八岁		(319)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	四十九岁		(340)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五十岁		(359)
身后记			(361)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361)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370)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372)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372)
1940 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373)
1941 年(民国三十年辛巳)			(373)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374)
1943 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374)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甲申)			(374)
1946 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375)
1947 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375)
1948 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376)
1956 年(丙申)			(376)
1958 年(戊戌)			(376)
1967 年(丁未)			(377)
1970 年(庚戌)			(377)
1978 年(戊午)			(377)
1983 年(癸亥)			(377)
1984 年(甲子)			(377)
1985 年(乙丑)			(378)
1986 年(丙寅)			(378)
1987 年(丁卯)			(380)
1990 年(庚午)			(380)
1993 年(癸酉)			(381)
1997 年(丁丑)			(381)
1998 年(戊寅)			(381)

2000 年(庚辰)	(381)
2001 年(辛巳)	(381)
2005 年(乙酉)	(381)
2007 年(丁亥)	(382)
2008 年(戊子)	(382)
《丁文江先生学行记》前言	(383)
附录 追悼丁文江佚文三篇	(389)
一、Obituary: Dr. V. K. Ting	(389)
二、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二次年会记事(节录)	(392)
三、悼丁文江先生	(394)

丁文江的一生及其评价

在近代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地质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丁文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的研究和活动范围甚广,涉及地质学、动物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军事、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等,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他或做出开拓性的贡献,或有其骄人的成就,或有着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评价丁文江,困难的不在于把握他的某一项具体的科技成就,实际上在他工作的领域都已有后来者超越了他。在科技史上,丁文江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他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局限,如在军阀孙传芳治下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亦不需我们作更多的辩解,他同时代的人已有足够的历史解释。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继续探讨这样一位科学人物,是基于对他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所树立的科学典范的纪念,是对他所树立的一种科学精神——丁文江精神的怀念。他有关发展中国科学的理念,他前瞻性的科学眼光,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他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他热情扶持青年学子的诸般善举,都是值得我们回

味和珍惜的历史遗产。作为一个历史标本,丁文江具有不朽的价值。

丁文江的一生(1887—1936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求学时期(1887—1911年),从他幼年在私塾阅读中国传统经籍开始,到1902年赴日本留学,再到1904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司堡尔丁中学、剑桥大学、葛拉斯哥大学求学,在求学过程中,他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治学志趣和专业选择——动物学、地质学。第二阶段是他的事业拓展时期(1912—1926年),他先后担任南洋公学教师(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所长(1913年)、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年)、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1—1925年)、淞沪商埠督署总办(1926年5月—12月)等职。在地质研究和调查、煤矿经营、社会政治活动领域,他一显身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所做的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奠定了基础。最受人非议的是他担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一职,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第三阶段是他的事业平稳发展时期(1927—1936年),从他避居北京、大连,研究、整理《徐霞客游记》,到他重返地质调查所赴西南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再到接受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的聘任(1931—1934年),最终倒在中研院总干事的岗位(1934年5月—1936年1月)。他在经过短暂的人生低谷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学术岗位,受聘北大研究教授、中研院总干事,当选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标志他的学术地位获得了最高承认。就丁文江一生发展轨迹来看,地质学研究、调查、经营与教学是其主要职业性工作,正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发挥的正确引导作用,中国地质学很快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政治则是丁文江不肯舍弃的追求,他常对朋友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①1927年6月9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徐新六,提到自己

^① 朱家骅:《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载1956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

欲做一部分《科学与政治》,“发挥我等政见的根本”。^①“科学与政治”可以说是丁文江一生的两大主题,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条线索。

丁文江去世后,1936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由翁文灏倡议,决定设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以奖励对地质工作有特殊贡献者,该奖从1940年至1948年间颁发过5次。1939年3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经陶孟和、李四光、胡适等提议,决定设立丁文江奖金。根据丁文江奖金章程规定,此项奖金给予对自然科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者。^②1947年6月,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址更名为在君纪念馆。这些纪念基金、奖金的设立,既是科学界对丁文江科学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了学术界同人对丁文江的深切怀念。

为缅怀丁文江的生平和志业,许多丁文江的朋友、学生陆续发表了悼念、追思性的文字,它们主要刊载在《独立评论》、《地质论评》、《国闻周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以及1956年出版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丁故总干事逝世廿周年纪念刊”,这些文字对丁文江做出了初步的评价。《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出版)是这些文字的结集,收入其中的39篇。胡适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是第一本丁文江传记(收入1956年12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约十万字,它是最早、也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丁文江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本有亲密的私人关系,因而胡适可将自己多年与丁文江直接接触的“经验”带入这本传记。胡适一生只写作了这一部当代人物的传记,足见他非常重视与丁文江之间的情谊。美国学者夏诺蒂·弗思(另一中文名傅乐诗,Charlotte Furth)撰写的英文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是外国学者第一本系统研究丁文

① 参见《丁文江致胡适、徐新六》,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436页。

② 《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二十六年度至二十八年度总报告》,第102页。

江的著作,^①它侧重于讨论丁文江的科学、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与中国新文化之间的关系。谷小水的《“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一书,主要探讨丁文江政治思想及其活动。其他值得提到的相关著作还有:王仰之的《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第一本丁文江年谱,篇幅虽短,但大体勾勒了丁氏一生的轮廓。马思中、陈星灿编著的《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Magnus Fiskesj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中、英文对照本),^②主要展现安特生、丁文江在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及其成就。丁琴海的《丁文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宋广波的《丁文江图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林任申、林林的《丁文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至于零星地出现在一些报刊上有关纪念、研究丁文江的文字,可参见本人编辑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1月出版)。可以说,现今已有的研究论著,在探讨丁文江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应承认,由于大家都是没有一部《丁文江全集》,或者接近于全集的《丁文江文集》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在资料占有上未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胡适当年写作《丁文江的传记》时,即明确地承认这一点。^③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一套《丁文江文集》,实属必要。正是基于这一要求,我们启动了《丁文江文集》这一文献整理工作。

评估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不仅需要我们具有一般的历史

① 中译本有[美]费侠莉著,丁子霖、蒋毅坚、杨昭译:《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3月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

② Magnus Fiskesj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Stockholm: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4。

③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说:“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02页。胡适所说的这种情形,后来的研究者虽有改善,但资料的占有,仍是一大问题,丁文江的英文作品,尤少见人采用。

专业素养,而且要求我们谙熟研究对象从事的专业工作和知识背景。在历史专业素养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加强历史技艺的修养(如搜集历史材料、解析文本信息,提炼历史观点),以强化“历史的细腻”和学术的精致;我以为还应提倡“历史学家的厚道”,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了解”,对历史人物作设身处地的考量。近代中国是一个历史转型的“大时代”,在“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年代,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学术的、职业的要求退居其次,这在使用人才,衡估历史时均是如此。当整个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革命性的政治观念相对淡化,专业工作的评判越来越严格,由此在历史领域产生的一个变化,人们对那些在专业工作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作家和从艺者重新予以认识,许多被湮没的专业工作者被挖掘出来,给予重新评价。与此同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文化含量,也成为我们衡量其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些备受争议的文化学术人物因其内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可能构成一大挑战,也为我们的研究预留了一定空间,成为考验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必要素材。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上的平衡、和谐。对丁文江的个案研究,正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科技史)领域这一新趋势的反映。

一、一个高级学者的知识准备

丁文江诞生在一个富绅家庭,故其童年有机会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史基础。据其兄丁文涛回忆:“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诸儒语录学案,每毕一篇,辄系以短评。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史督师。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昼夜讽

诵不辍,重其有种族观念也。”^①这段文字反映丁文江童年接受了常规的私塾教育,倾慕陆贽、史可法、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诸贤,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甚大。

显示丁文江早年的才学和志趣,是他的两篇作文。一篇是在十一岁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一篇是在十五岁时赴泰兴县城应知县龙璋面试所作《汉武帝通西南夷论》,龙璋阅卷后,“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②

对自己所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丁文江本人似不太满意,1935年 he 发表的《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站在新文化的立场对传统教育忽视体育运动和私塾教师的写作能力批评道:“三十年前受教育的青年都是在旧式私塾里读书的。不特一切的新式运动完全没有梦见,而且受了‘规行矩步’的影响,终年不肯劳力,因此‘书生’变这全国最‘文弱’的阶级。”“我十六岁以前没有步行到三米以上,学地质的时候才努力学了走路。”“教我书的先生是一位名贡生,但是他写封普通信札,还不如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写得流畅。”^③传统私塾教育忽视体育运动,这是人所皆知的通病。教书先生写不通信札,应属个别案例,可能与泰兴县当时教育的不甚发达有关。

丁文江赴日留学仅一年半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生活,我们现可依的材料甚为稀缺,故不得其详。^④ 丁文江本人在《中国学生》(*Chinese Students*)一文中谈及学习日语时声称“一个聪明的

①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关于丁文江出国留学前的学业情况,目前仅存丁文涛一文有简略说明。

② 丁文涛:《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将丁文江见龙璋一事置于十三岁,现依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改。

③ 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载1935年3月31日《独立评论》第144号。

④ 关于丁文江留日时期的生活,仅有三篇文章有简略记载:一、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收入丁文江主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10月再版。二、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载1936年7月5日《独立评论》第208号。三、汤中:《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载1936年7月26日《独立评论》第211号。丁文江本人有两篇文章片断地记述或提及这段生活:V. K. Ting, *Chinese Students*, *Westminster Review*, Vol. 169, No. 1, January 1908。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载1935年3月31日《独立评论》第134号。

中国人在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后阅读日语没有任何困难”，^①这应是他的个人经验之谈，否则他绝不会如此武断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他对自己的留学生活略有提及：“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我第一次在日本学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②显然，他应进入了学校读书。《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在他去世后发表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A True Patriot*)悼文中说：“因为那学校课程并不严格的缘故，他转换了方向，研究法律，正像他自白中所谓，他曾费去大部分的时间来写很多的革命论文，以及吸了很多的卷烟。”^③留日生活是丁文江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他走出国门，学习了第一门外语——日语，对日本社会文化有了真实的体验和观察；他开始接触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为自己进一步深造做了初步的准备。

丁文江留学英国七年(1904—1911年)，其中在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的一所中学读书两年(1904—1906年上半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半年(1906年下半年)，“选习的大概是文科”；^④赴欧洲大陆游历半年(1907年上半年)。关于这一年的学习情形，与他同伴的李毅士有所提及：“他在剑桥大学时，受了名师的指导，于英文一项，竟告完成。他的文字居然于这个时期在一两个大杂志里发表。至于他在大陆上居住，不特使他对于欧洲政治的观察有了长进，又使他的法语可以谈话自如。”^⑤在葛拉斯哥的工科学院预备考伦敦大学医科半年(1907年夏至1908年初)、在葛拉斯哥大学三年(1908—1911年)。在葛拉斯哥大学，丁文江主修为动物学，副修为地质学、天文学。该校档案馆现今仍保留丁文江在校学习的学业档案，并在网络版的收藏简介中特别说明这一点。检索该校的《学位与奖学金名单》(Degree and Prize List)可知，丁文江在大学时期的学业成绩优异，动物学(Zoology)：1909年夏季学期(Summer

① V. K. Ting: Chinese Students, *Westminster Review*, Vol. 169, No. 1, January 1908.

② 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载1935年3月31日《独立评论》第144号。

③ A True Patriot, *The North-China Herald*, January 7, 1936, p. 4.

④ 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载1936年7月5日《独立评论》第208号。

⑤ 李毅士：《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载1936年7月5日《独立评论》第208号。

Session) 获奖章 (Medal) 和一等证书 (First-Class Certificate, 仅一名), 1910 年按学业成绩 (In order of merit), 获二等证书 (Second-Class Certificates), 排在第 14 位 (共 21 位, 其中一等证书 10 名)。地质学 (Geology): 一次获奖章 (Medal, 仅一名) 和一等证书 (First-Class Certificate, 排列第一, 共 12 名), 一次获一等证书和奖章、考华奖 (Medal, Cowia Prize) 的唯一获得者。天文学 (Astronomy): 获一等证书 (First-Class Certificate)。葛拉斯哥大学教授泰勒 (G. W. Tyrrell) 曾这样谈及当年他对丁文江的印象: “我记得丁是一个矮个子、身材结实、宽肩膀的中国学生, 他极为聪明、富有个性, 表现出后来在他身上所出现的卓越的特征。已故的格里哥里教授对丁的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也许不能过分地说丁受到了这位杰出人物的影响。丁通过经常地通信保持着与葛拉斯哥大学地质系的联系, 并使我们熟悉中国地质学的进展。”^① 关于自己的留英学习生活, 丁文江也略有提及:

当前清光绪末年考留学生的时候, 以人情得着官费的大概在一半以上。当时规定私费学生能够考进外国大学的可以递补官费。我考进了大学, 而且几次考得第一。但是始终没有得着官费。同时有屡次入学试验不及格而补得两个官费的人!^②

这段简要的回忆文字, 除说明他未得官费一语不太确凿外, 其对成绩的说明与该校保存的材料完全一致, 表明丁文江当时确为该校的一名优秀学生。在 20 世纪初中国人的留学热中, 虽有大批青年学子跨出国门, 或留学日本, 或留学欧美, 但真正学有所成者并不太多。像丁文江这样学业成绩优异者, 可谓凤毛麟角。^③

留学期间, 丁文江全力以赴投入自己的学业和专业训练, 几乎

① G. W. Tyrrell: *Dr. V. K. Ting*, 载 1940 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 20 卷, 第 369 页。

② 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 载 1935 年 3 月 31 日《独立评论》第 144 号。

③ 在留日学生中, 1905 年蒋百里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 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 日本人引以为荣。此次为中国留学生所得, 他们不免耿耿于怀。所以, 从第四期起, 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 以防中国学生再度夺得锦标。参见陶菊隐:《蒋百里传》,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2 月版, 第 10 页。此例凸显出当时留学生中学业成绩的民族主义性质。

没有阅读一本“国书”。踏上祖国的土地,即经前辈叶浩吾指点,他开始搜购《徐霞客游记》,以一个受过地质学、地理学训练的学者特有的眼光研读此书。以后,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从事教学和科研,他的治学兴趣继续拓展,他的知识、思想渐次进入一个新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的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与梁启超、张君勱、蒋百里、徐新六等一批研究系朋友的结交,对他的治学兴趣向社会政治方面,甚至军事方面发展,应有极大的影响。二是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胡适等北大新派教授的结识,对他参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三是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华的讲学活动及其思想引导,对他的思想拓展,有很大的牵引力。“五四”前后,丁文江在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思想言论等方面,都明显地突破了地质学专业的圈子,朝着更为广阔的学界、政界方向发展。

丁文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一文,文中将“平日自己爱读的书,同这一次参考过的书列举出来”,“供读者选择”,并对其中有些书目的要旨略作点评。生物学与演化论方面有:达尔文著《物种由来》,“要知道达尔文的学说,最好是看他自己的书。我不知道在中国批评他学说的人,有几个从头至尾看过这部名著”。威尔逊著《发生同遗传中的细胞》(E. B. Wilson: *The Cell in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冒根著《试验动物学》(T. H. Morgan: *Experimental Zoology*),“这两部都是近代的佳作,但是都是为专门学者说法的”。孔克林著《遗传与环境》(E. C. Conkli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托姆森著《遗传性》(J. A. Thomson: *Heredity*),这两种比较容易懂。理化学方面的有:爱因斯坦著《相对论》(Einstein: *Relativity*)、苏点著《物质与能力》(F. Soddy: *Matter and Energy*)、施罗森著《创造的化学》(Slosson: *Creative Chemistry*)。人种学方面的有:琦士著《人类的古代》(A. Keith: *The Antiquity of Man*)、德克峨士著《体形学与人种学》(W. L. H. Duckworth: *Morphology and Anthropology*),“这两部都是很重要的书,但是没有学过比较动物学的人是不容易看得懂”。德克峨士著《有史以前的人》(Duckworth: *The Prehistoric Man*)、戈登外叟著《人种学引论》(Goldenweiser: *Early Civilizatio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

ogy),这两部书“比较的浅近”。科学历史,方法同人生的关系方面有:赛推克著《科学小史》(W. T. Sedgwick and H. W. Tyle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梅尔士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J. T. Merz: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19th Century*)、皮耳生著《科学的规范》(Karl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詹文斯著《科学通则》(S. Jevons: *The Principle of Science*)、赫胥黎著《方法与结果》(Huxley: *Method and Results*)和《科学与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韦布伦著《近代文化(明)中科学的地位》(Veble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苏点著《科学与人生》(F. Soddy: *Science and Life*)、鲁滨孙著《在制造中的人》(Robinson: *The Mind in the Making*)。心理学方面有:詹姆士著《心理学的通则》(W. James: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和《心理学教科书》(*Text Book of Psychology*)、诺司峨塞著《孩童心理学》(N. Northworthy and M. T. Whitley: *The Psychology of Childhood*)、何尔姆士著《动物智慧的进化》(S. J. Holmes: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Intelligence*)。关于知识论同玄学的:马哈著《感觉的分析》(E. Mach: *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罗素著《心之分析》(B.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ind*),“罗素这一部书是介绍心理学同哲学最好的著作。他是为中国学生做的。所以说理是由浅入深,引证是折衷众说,而他的文章简练活泼,步步引人入胜”。杜威著《哲学的改造》(J.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实验论理文存》(*Essays in Experimental*)、和《德国的哲学与政治》(*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要知道君劝所信的正统哲学在德国政治上发生的恶果,同对于欧战应负的责任,不可不读此书”。柏格森著《创造的进化》(H.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心理的能力》(*Mind Energy*)、开仑著《詹姆士与柏格森》(H. M. Kallen: *William James and Henri Bergson*)、哀利屋特著《近代科学与柏格森的幻想》(Eliot: *Modern Science and the Illusions of Prof. Bergson*)。^①这是一份内容涉及多学科的书目,可见丁文江当时的阅读兴趣之广。除了动物学、生物学系其所学专业外,其他如物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载1923年6月10日《努力周报》第56号。